

# 回忆我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日子

20世纪50年代初，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赴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到地拉那大学学习，1957年毕业回国，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随着中阿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以至形成“特殊友好”的岁月，我有幸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逾百次为周恩来总理做阿语翻译。周总理的言传身教、入微关怀，使我倍感亲切，受益终身。

## 关心下属，独忘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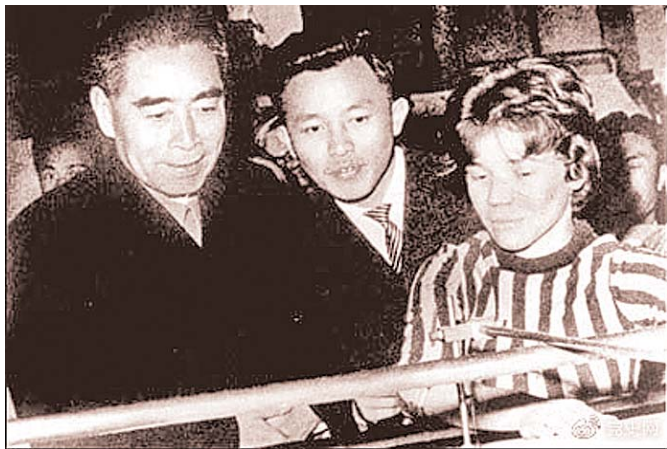
1964年新岁伊始，周恩来总理在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陪同下，于元月6日乘车前往亚得里亚海滨城市发罗拉访问，我同车做翻译工作。由于连日来我白天随周总理参加会谈、参观，晚上经常忙于宴会、演出等场合的口译工作，活动后还要与同事们译、校双方的讲话稿，前台后台忙个不停，感到精力有些不支。对此，周总理是有所了解的。

此次在去发罗拉约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中，开始我还在正常地为中阿两国总理的轻松交谈做翻译。可是稍后，随着车轮滚动，我则不由自主地双眼朦胧起来……当自己忽然发觉是在打瞌睡时，手表上的指针已经过了8分钟。哎呀，我已经误了8分钟的事！此刻，两位总理竟还在“轻言慢语”地交谈着，用的是中阿两国首都都会说的法语。

我自感愧疚，因为这是失职啊！谢胡总理笑着对我说：“范同志，是周恩来同志有意不叫醒你。”周总理则亲切地对我说：“小范，再眯一会儿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趣啊！

羞愧之余，我心里想：自己和同事们所谓的“缺睡眠”“很劳累”，是积几天形成的。而周总理这位公认的“不知疲倦”的人，他长年累月一贯如此。在此次出访14国期间，周总理每天工作15—18个小时。尽管如此，他还是从我的几分钟“打瞌睡”中，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于中国代表团中的“问题”。

在车队到达发罗拉宾馆后，周总理在宾馆大厅当众宣布：“访阿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这些天，同志们都非常辛苦劳累。经与谢胡同志车上商量，今天午饭后直到傍晚，不安排活动，大家好好睡个觉！”这几句了解下情、富有人情的



周总理1964年访问阿尔巴尼亚时，范承祚(中)给总理作翻译。

讲话，真是说到随行人员的心中了。午饭后，我亲眼看到同桌进餐的周总理登上楼梯，进了他的套间卧室。我也进屋适当休息。至于午睡，我自从来在车上打了瞌睡后，头脑兴奋得很，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我推开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卧室窗户，眺望大海。

正当我的紧张心情有所放松之际，忽见楼下花园台阶处走上几个人，其中就有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原来周总理不曾休息，而是在同阿方警卫及联络人员来到发罗拉宾馆花园内散步聊天，接触群众去了。

当晚，在霍查、谢胡等阿国领导人参加的发罗拉党政机关为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总理在同阿方主要领导人交谈的同时，又分别同出席宴会的当地反法西斯老战士、民间艺术家们广泛接触。活动结束后，周总理又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深夜。

## 批评鼓励，诲人不倦

周总理的言行，一向“严”字当头。对人严，对己更严。我个人就曾受过周总理的两三次批评，有间接的，更有直接的。

这些批评使我毕生受益。1966年4月下旬，我在短期下放山西8个月后，提前调回北京，匆匆上阵，参加阿尔巴尼亚总理访华翻译工作。其间，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办公室，我在一旁亲耳听到周总理打

来电话。他批评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苏联东欧司负责同志在接待工作上有薄弱环节，并两次提及我在会谈和群众大会上翻译的缺点：为什么范承祚此次在讲外语时，表达不畅，显得吃力？“我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时，只见他给谢胡‘咬耳朵’，而拿不出阿文译稿来”。

面对周总理在电话中对我的“间接批评”，我深感愧疚。接电话的余湛同志(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先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并检讨“接待国宾工作不力”“组织人员工作未做好”。他还在向周总理所作的汇报中为我“解脱”：小范去山西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8个月，不曾有机会接触外文。周总理听了余司长这番话，了解了我一时翻译“吃力”的原因，并立即指示：今后，翻译干部和外语人员不管是下放基层，还是去“五七干校”，都要保证他们有学习、巩固外语的时间。

我也曾受过周总理当众的直接批评。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冬季，中方在全国政协礼堂为阿尔巴尼亚国庆举行庆祝会。出席这一活动的周总理会前在会客厅同阿大使罗博和阿访华代表团交谈时，提及我国自然气候每年有“两股风”：一曰冬春季来自戈壁、有时带有沙尘的西北风，一曰夏秋季的台风。周总理突然考我：“小范，台风来自哪里？”我竟未加思索地脱口回答：“台风来自台湾海峡。”

对于我的回答，周总理颇不满

意。他把脸一沉，面对在场的中阿人士说：我们外交部的翻译啊，一不学历史，二不学地理。哪里有台风是来自台湾海峡的呢？它是来自南海的深海区域嘛！周总理的这一批评实际上又给我和在座的中方人员上了一节生动的气象、地理课。我不仅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还翻译给罗博大使等阿尔巴尼亚外宾。客人们看到我受批评、面红耳赤地翻译，也为我感到有点紧张。

周总理的批评点到为止，他接着话锋一转，又对在场的中阿人士说：“范承祚，我对他是了解的。他是我的老乡，平素工作积极、勤奋、负责，为人也比较诚实……”阿大使等听了周总理对我的鼓励后，频频点头。此时，庆祝活动即将开始，大家高高兴兴地进入会场。

从周总理的批评中，我发现自己在语言和知识方面的不足，并把这些语重心长的批评当作扎实学习的动力。我将周总理的批评原汁原味地登在外交部的《每日简报》上，让我的同行、同事们也不同程度的从中受益。

## 挑灯夜战，雷厉风行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个冬夜，朔风凛冽，寒气袭人。北京三里屯东九楼住处传达室的电钟刚敲过第一响，一阵清脆的电话铃把传达员唤醒，我被从楼上叫来接电话。“哪一位啊？”我满以为是为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找我有事。“我是周恩来。”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苏北口音。“啊，总理！”我不由自主地攥紧了电话线，将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生怕听错一个字。

“小范，我把你从被窝里提出来了，你感到既亲切，又羞愧，更多的是敬意——冬夜，我们年轻一辈在家睡觉，老一代的同志还在工作。我从电话里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小范，你马上找一下韩叙(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让他和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事找你们商量。”

我们都领教过周总理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韩叙同我不敢怠慢，第一时间乘车通过寂静、宽阔、明亮的长安街，很快到达西花厅。在这里，周总理同其下属挑灯夜战的又一个新的回合开始了……

## 平等待人，体贴入微

周恩来总理关心人首先体现在平等待人上。他常说，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周总理的体贴入微更体现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如他在会见、宴请外宾时，都有译员的正式座位，一般安排在他左侧。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感受到了阵阵暖意。尤其令人倍感亲切和鼓舞的是：1964年春，周总理结束亚、非、欧14国访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报告会上，还专门把此行的主要译员冀朝铸(英语)、齐宗华(法语)和我(阿尔巴尼亚语)叫上演讲台，向万名听众介绍了我们三人。

1969年“五一”之夜，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新到任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当中国最高领导层诸成员一字排开，准备合影时，现场其他人员迅即闪开。此时，我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毛主席突然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心知肚明，却不敢回应。接着，毛主席又轻轻对我做了一个招手动作——示意我进入摄影行列。那一刻，我简直不知所措。细心睿智的周总理看到毛主席的动作，立即向我发话：“小范，进来照相，是主席让你进来的！”我应声遵从。

是夜无眠。我惦记着摄影时的一幕，更寄希望于明天见报时摄影记者将这张重要图片中“左起第一人”剪掉。否则，我该如何向本单位的同事们解释啊。没想到，我的“心神不定”早已被敬爱的周总理看破，得到了他的理解，乃至他亲自为我“解围”。

周总理从天安门城楼回到西花厅办公室后，担心外交部有关单位和人员不明“拍照事件”的个中经过而有所非议，于是亲自拿起电话，告知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明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将在头版刊出一张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会见阿尔巴尼亚新大使的图片，范承祚也在其中。周总理特别强调，是毛主席和他本人要我参加照相的，并嘱咐相关人员，见报后，如有人非议此事就照此解释……

(文/范承祚 来源：《学习时报》)

# 陈卜人：与敌人激战至最后一刻

陈卜人(1917—1945)，原名陈晏丞，梅县雁洋镇南福塘背村人。

1937年1月他与王维、梁集祥、陈晓凡等9人在雁洋南福村秘密成立了梅县抗日救国会。是月，陈卜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陈卜人与梁集祥等人又成立了南口星聚党支部，领导南口一带的爱国救亡运动。陈卜人还亲自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激发了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与此同时，陈卜人兼任南洋《新报》记者，经常向南洋的侨胞报道祖国的消息，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侨胞的抗战热情，他们纷纷回国参加抗战。

1937年10月，陈卜人先在新四军二支队瑞金办事处任主任，随后调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巡视员、闽西特委书记；1938年2月改称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后，任特委秘书长。其间，特委先后在福建龙岩白土、永定西溪、上杭连四乡以及梅县等地开办党校或党训班，为闽西南和潮汕、兴梅培养了大批党员骨干。

1939年11月，陈卜人参加了在梅县松源田心村(现新南村)王维家里召开的闽西南潮梅特委第六次扩

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讨论精干隐蔽、蓄力待机方针，准备应付突然事变，选举叶剑英、王维等7人为党的七大代表。

1941年闽西事变后，陈卜人执行上级指示，采取分散生产、隐蔽斗争的策略，把各地干部分散到各基点村和山区群众结合在一起，以群众面目出现，领导生产、保卫生产、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壮大革命力量。

1945年5月间，中共闽粤边区工作委员会在福建省永定县金丰大山召开闽西军政会议，刘永生、魏金水、陈仲平、陈卜人等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决定将王涛支队扩编为三个大队，第一、三大队由刘永生负责，开赴闽南；第二大队由陈卜人、范元辉等负责，开赴上杭、武平、蕉岭、梅县开辟新区，进一步扩大闽

西南根据地。

会议之后，陈卜人率领第二大队，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自己武装。1945年8月，王涛支队第二大队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第一支队在广东梅县松源王寿山会师后，获悉在离松源20多华里的蕉岭县南公式村，原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家里存有一批枪支弹药。为补充军械装备，壮大武装力量，部队决定由陈卜人和邹子昭带队，率领王涛支队第二大队和韩江纵队第一支队22人组成的精干小分队前往黄涛家收缴其枪支弹药。

这支精悍的轻骑队，昼夜兼程，很快接近了目标。为了慎重，他们先到松源田心村中共梅县中心县委书记王维家。此时王维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其兄王进秀见到自己的部队，喜出望外，热情地向他们提供敌情：国民党调来了几百人兵力，加强对松源的防卫。因王维

家与松源圩只一河之隔，为防不测，陈卜人当机立断，决定星夜把部队转移到鹞子顶埋伏。鹞子顶海拔568米，位于梅县松源与蕉岭县步上村的交界处，距黄涛家只有十华里，便于出奇制胜。是夜，部队摸进鹞子顶山腰，在丛林里露宿隐蔽，伺机而动。

1945年9月10日，骄阳似火，烤得战士们满身是汗。到了夜里又风雨交加，把战士们的衣服淋得湿漉漉的。翌日，正逢松源圩日，雨过天晴，秋风送爽，战士们把被淋湿的衣服挂在树枝上晾晒。忽然一群进山打柴的山民路过他们的宿营地，战士们以为都是当地的群众，只嘱咐他们不要声张出去，便让他们进了山。

可是，其中有一家伙进山后便绕道赶回松源圩，向国民党部队告密。国民党驻松源的黄承率率领100余人，将鹞子顶重重包围起

来。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陈卜人充分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迅速烧毁全部公文，立即部署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陈卜人既是指挥员，又是最前线的战斗员。在陈卜人的指挥下，战士们个个以一当十，利用地形地貌作隐蔽，跟敌人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陈卜人在山头的高处指挥战斗，同时向敌人投放土炸弹，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不敢前进半步。

正当陈卜人站起来观察敌情，并准备再向敌人投土炸弹时，忽然一排子弹打来，击中陈卜人的咽喉。旁边的一个战士见状，立即扑过去，背起他撤下火线，其余几位同志继续阻击敌人。陈卜人躺在野草丛中，殷红的血流在地上，染红了野草。当同志们准备背他转移时，他用坚决的动作拒绝了，并示意同志们撤退，保存力量。陈卜人英勇牺牲，年仅28岁。

1945年10月，中共闽粤边区工委为了纪念陈卜人烈士，将王涛支队第二大队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第一支队统一整编为卜人大队。(来源：《梅州日报》)